



对当代儒学两种观点的批评(刘东超)

(2005-5-12 10:24:05)

作者：刘东超

以上我对当代儒学中两种比较激进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还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两种观点之间也有较大的区别。从理论上来看，蒋先生的观点显得单薄和怪异，康先生的观点则较为充实和深刻。坦率地说，我觉得蒋先生语言表述和思想运作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其语言的贫乏枯燥和思想的捉襟见肘是相当明显的。而我虽然不能同意康先生的一些观点，但却对其学识相当钦仰。我之所以冒学界之大不韪指出对于蒋先生的评价，一是希望蒋先生本人有所自省和改进，二是希望盲信蒋先生者有所冷静和清醒。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能予蒋先生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从而避免他可能产生的误导，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弘扬工作是有益的。同时我也要指出的是，对于蒋先生学术水准的较低评价，并不意味着对其人格的较低评价。虽然我对蒋先生的为人也微有不解之处，但在总体上还是十分尊重的，尤其对蒋先生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我深为敬佩。也正是因此，我才对蒋先生予以坦诚的、童言无忌式的批评。

话到此处，请允许我回到这次会议的主题——“共同的传统”，并将再涉及一下对上面两种观点的认识。当代国人的确拥有深厚悠长的共同传统（这里是就我们民族整体而言，至于个人的传统还是存在巨大不同的），但立足于当代全球和全国的层面上，我们不应该将这一传统理解得过于狭窄，仅就思想文化而论，它至少包括儒、释、道三家。在当代中国，有的论者（蒋庆先生较为典型）一谈到传统文化仅仅就儒学立论，有意无意地忽略另外两家的存在，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我们真正发挥传统的巨大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也许认为，释道二家都是出世之学，就入世而言我们只有儒家传统，康晓光先生要将儒学建立成新国教显然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虽然粗糙地就历史而言是可以大致成立的（实际上如果细说也不太准确），但立足于今天中国现实，立足于整合人类诸多传统的全球化潮流，不充分考虑释道二家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此二者既包括出世的内容，也包括入世的内容（至少可以通过阐释建构出庞大的崭新入世内容）。不仅其入世的内容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儒学及其他各家的缺失，其出世的内容对于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及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提供借鉴。因此，无论从基本的史实还是从长远的功用，我们都应该广阔地理解我们共同的传统。而这也是我们理解“中国性”的一个基准思考点。

最后，请允许我对“中国性”（chineseness）和儒学的关系问题略微展开几句。我们知道，当代诸多学人对于儒学的重视和他们对于中国性的思考有关。但我感觉，其中少数人对于中国性的理解有些狭隘和僵硬。实际上，中国性是一个大致稳定的概念，也是一个向前流动的概念。从前者来看，中国性主要是由民族历史和现实力量确定的。当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甚至体育等各方面的力量毫无疑问是确定中国性最为主导的因素，而中国历史带来的人口、疆域、民俗、文献、思维方式显然也是相当重要的内容。不过，就现实和历史比较来说，无疑是现实的作用要大一些。而就历史中诸多因素而言，传统思想（基本保存在文献中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中）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层面，儒学是这个层面上最为重要的一家。不过，由这些因素所占比重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确定中国性上的问题上不应该将儒学功能拔得太高。从后者来看，中国性还在随着当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变迁，而这一变迁是在承接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历史规律主动建构的过程。有的论者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利用儒学、并提升其所占比重，在不违背基本事实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当然是可以的。但极少数论者有些不切实际的激进期望，希望主要以儒学来重塑中国性，在我看来是应该予以认真反思的。实际上，即使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综合中国传统思想各家并汲取国外诸派思想中的优长之处，以形成塑造中国性的综合进路，倒不失为一条更为平实的思考方向。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关闭窗口\]](#)